

## 论沈从文小说的叙事语言及其功能

李亚林

叙事语言是叙事者借以完成叙述行为的工具,也是读者与叙事文之间的媒介,叙事语言是构成小说叙事形态的至关重要的方面。

沈从文小说叙事语言的特点早在三十年代就为评论家所注意。苏雪林曾说:“句法短峭简炼,富有单纯的美”,“次则用字造句,虽然力求短峭简炼,描写却依然繁冗拖沓。”<sup>①</sup> 同时代还有人认为沈从文的小说“方言和成语太多”<sup>②</sup>。近年来,研究者已注意到题材内容与其语言形式之间的关系,“沈从文写小说,也许可以认为有三套笔墨(自然就其‘大略’而言)。写城市、知识者诸篇文字的琐细以至时见冗赘,写湘西普通人生活的极其自然明净与节制,和《神巫之爱》、《龙朱》诸作的铺张奢华——统一了民间俗文学的机智与贵族式的风雅。”<sup>③</sup> 凌宇则认为“最能反映沈从文小说语言特色的,是他用来表现乡土人生的乡土语言。”<sup>④</sup> 他在《从边城走向世界》一书中着重分析了沈从文早期小说与成熟期小说的不同特色,这种带有历时性特点的研究对于揭示沈从文小说叙事语言由尚欠火候到炉火纯青的演变过程极为有益。

研究角度当然不只一种。

本文试图从叙述性语言、描写性语言、人物语言三方面对沈从文小说的语言及其功能加以剖析。

一般地说,叙述性语言多用于对故事发生的缘由、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和环境进行概括性的说明。沈从文小说的叙述性语言平实简洁、含蓄凝炼,短句居多,语气上常常冷静自如,不露声色,这种风格的语言使其小说获得真实、平和的美学效果。

沈从文的大量小说都具有浓厚的自传色彩,这些小说以写实的笔法记述了沈从文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小说《在私塾》所叙述的逃学情形从《从文自传·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中可以得到印证,《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所叙述的传奇故事在《从文自传·清乡所见》中有相关记载,《我的教育》、《槐花镇》与《从文自传·怀化镇》的记述则有太多的相似,而《寄给某编辑先生》、《一天是这样过的》、《棉鞋》等小说简直就是沈从文当年在京、沪两地时窘迫、烦闷生活的真实写照。《石子船·后记》可以作为这类小说的历史参照物的,作者写道:“这一集编成

① 苏雪林:《沈从文论》,《沈从文研究资料》(上),花城出版社 1991 年版。

② 贺玉波:《沈从文作品批判》,《沈从文研究资料》(上),花城出版社 1991 年版。

③ 赵园:《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论小说十家》,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

④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第 318 页,三联书店 1985 年版。

的时候是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因为没有伙食,一家人并一个久病在床的老母也饿了一餐。……”<sup>①</sup>的确,沈从文的不少小说都是以逼近生活的原生态为创作目标:“事情完全是平常事情,故既不夸张也不剪裁的把它写下来。”<sup>②</sup>他认为:“好的小说在一切俨然如真,不在有头有尾。就效果言,也用不着那种大团圆或角色死亡的悲惨作结束。”<sup>③</sup>《贵生》、《丈夫》、《萧萧》、《菜园》等都具有一种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那种不动声色的叙述语气,则更加强了小说的真实感。

叙述性语言的功能还表现为对小说的基调与节奏的影响。

基调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主旋律,沈从文小说的基调用他本人的话说,“即作品一例浸透了一种‘乡土抒情诗’气氛,而带着一份淡淡的孤独悲哀,仿佛所接触到的种种,常具有一种‘悲悯感’。”<sup>④</sup>在其不少小说中,基调往往是在开头的叙述中就奠定了,而后通过情节的演进得以持续,结尾的叙述大多会起到呼应、渲染或强化的作用。如《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开头的叙述:“因为落雨,朋友逼我讲落雨的故事,这是其中最平凡的一个。它若不大动人,只是因为它是真实的。我们都知道,凡美丽的都常常不是真实的,天上的虹同睡眠的梦,便为我所作例。”这段平实的文字隐隐地透露出一种悒郁、惆怅的情绪,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三个男人所钟情的女子死了,豆腐铺那个少言寡语的老板失踪了,“号兵”一生悒郁寡欢,“我”有点忧郁。“有些过去的事情永远咬着我的心,我说出来时,你们却以为是个故事,没有人能够了解一个人生活里被这种上百个故事压住时,他用的是一种如何心情过日子。”结尾的这句话强调了全文低沉的基调。小说《萧萧》悲悯的基调在结尾的叙述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渲染。“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月毛毛,却在屋前榆蜡树篱笆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萧萧对自己不幸的命运浑然不觉,可是又一代萧萧将重演萧萧的过去,这怎不令人油然而生一种悲哀、怜悯之情?《丈夫》、《一个女人》、《王嫂》、《菜园》、《生》等小说的叙述性语言也都具有这种影响全文基调的作用。

沈从文小说的叙述性语言呈现出舒缓从容的节奏感。

小说《爹爹》的开头是这样一段叙述性文字:

“在湖南保靖县城沿河下游三里路远近一个地方,河岸有座小小的坟。这坟小到同平常土堆一样,若非这土堆旁矗立的一块小碑,碑上有字,则人将无从认识这下面埋得有一个人了。说是碑,也只是一段刨光了的柏木罢了。木上用生漆写得有字,字并不记这死者姓名籍贯,也不写立这一段木头的人姓名。”

我将这段引文中重复出现的词汇用同一字母表示,当新的词汇在句中出现时,则换用另一字母表示,这样就可以将词汇重复的情况演示为:AA—BB—CC—DD—E—D—FF—EE—F。相同的句式也在文中一再重现,如“河岸有座小小的坟”,“碑上有字”,“木上用生漆写得有字”等。经过重复的艺术处理,这段叙述文字的叙述速度减缓,从而形成舒缓从容的节奏感。类似于此的叙述性语言在《边城》、《长河》、《三三》等小说中均有所见,这一语言技巧显然来自民间

①② 沈从文:《〈石子船〉后记》,《沈从文文集》第3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7月第一版。

③ 沈从文:《答辞八》,载于1936年1月15日天津《大公报·文艺》。

④ 沈从文:《〈散文选译〉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0年版。

文学叙述方式的启迪。有些小说是以“插入”的方式控制节奏的。在《张大相》中,当杂货店老板开箱取货时,故事中的人物与读者都急于知道箱中的货物究竟是什么,但作者却出乎意料地在此处插一段张大相身世与性情的叙述,从而减慢叙述的节奏,这样的技法在《大小阮》、《一个母亲》、《王谢子弟》等小说中都不乏其例。叙述性语言还可以通过对详写与略写的处理来使小说保持舒缓的节奏。《三三》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三三如一般小孩,换几回新衣,过几回节,看几回狮子龙灯,就长大了。”作者无意于对三三成长过程的叙述,因此一笔带过,而将笔墨集中于对三三这个十五岁的乡下少女朦胧的性爱心理的描摹。详略的对比中,节奏由快而慢的过程也展示出来,《菜园》、《会明》、《萧萧》、《一个女人》等小说都采用了这一技法。

描写性语言主要是对环境、景物、人物肖像、心理动作等的具体描绘,沈从文小说的描写性语言善于运用动词、形容词和各种新奇的比喻,以细腻、恣肆见长。

沈从文将文学创作看作是“一种‘扭曲文字试验它的韧性,重摔文字试验它的硬性’的体操。”<sup>①</sup>他对文字性能的敏感在词的选用方面得到了体现。“到了这乡下以后,我把一个乡间的美整个的啃住,凡事都能使我在一种陌生情形下惊异。”一个“啃”字,传神地写出了来自城里的“我”被乡村之美所吸引的情状。再如《连长》中所写:“这时屋里人相对着脸相都还很分明,但是渐渐的,屋中角落以及那些桌子下面坛罐器皿却已为黑暗偷偷悄悄搂着了。”动词“搂”,既写出了个落雪的夜晚室内摆设被渐渐降临的黑暗所笼罩的情景,又烘托出连长与寡妇这对露水情人离别前难舍难分的气氛。还有《月下小景》中的描写:“日头向西掷去,两人对于生命感觉到一点点说不分明的缺处。”作者没有选用人们司空见惯的“落下”,而是用了给人以陌生感的“掷”字,“掷”字写出了一对沉浸在爱河之中的青年男女对于时间流逝之快的感受,更突出了俩人真诚、炽烈的爱情无法抗拒残酷风俗的沉痛心境,这个意味着自然界中的黑夜很快就会来临的“掷”字,也预示着即将降临于一对恋人身上的悲惨结局。类似的用法真是不胜枚举!形容词、比喻句的使用和对文言文句式的借鉴丰富了描写性语言的表现力,如《长沙·秋》中的一段景物描写:“祠堂位置在山坳上,地点较高,向对河望去,但见千山草黄,起野火处有白烟如云。对落中乡下人为耕牛过冬预备的稻草,依附树根堆积,无不如塔如坟。银杏白杨叶成行高矗,大小叶片在微阳下翻飞,黄绿杂色相间,如旗纛,如羽葆。又如有所招邀,有所期待。沿河橘子园尤呈奇观,绿叶浓翠,绵延小河两岸,缀系在枝头的果实,丹朱明黄,繁密如天上屋子,远望但见一片光明幻异,不可形容。”——这段描写所使用的比喻句集色彩感与形象感为一体,表现了辰河中部吕家坪地方秋收时节的一片兴旺景象,“千山草黄”、“白烟如云”、“绿叶浓翠”、“丹朱明黄”等词组和“但见……”的句式则给这段描写增添了一种古典美,文白杂揉的语言赋予小说以陶渊明《桃花源记》的韵味。

如果说沈从文小说的叙述性语言讲究节制,以平实取胜,那么描写性语言则以铺张恣肆、细腻优美见长。有时为了渲染自然景物之美,沈从文主张动用各种感官,“用各种官能向自然中捕捉各种声音,颜色,同气味,向社会中注意各种人事。脱去一切陈腐的拘束,学会把一支笔运用自然,……在现实里以至于在回忆里同想象里驰骋,把各种官能同时并用,来产生一个‘作品’。”<sup>②</sup>如小说《渔》中的一段描写。“人走着。月亮的光照到滩上,大石的一面为月光所不及,

① 沈从文:《情绪的体操》,《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② 沈从文:《幽僻的陈庄》题记,《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如躲有鬼魔。水虫在月光下各处飞动,振翅发微声,从头上飞过时,俨然如虫背上皆骑有小仙女。鼻中常常嗅着无端而来的一种香气,远处滩水声音则正像母亲闭目唱安慰儿子睡眠的歌。大地是正在睡眠,人在此时正全如梦中。”作者在此通过人物的视觉、听觉、嗅觉表现了一个月光如银的夜晚,大自然中的光色、声音、气味给人的一种如梦似睡的感受。有时,作者还着意于表现人物瞬间的幻觉,如“这房中开了窗子,地当面,放进来的是一缕带绿色的阳光。……”——这里“绿色的阳光”正是病中的阿黑看见从竹园中透过的阳光时所产生的幻觉,这种描写深得印象主义的神韵,海外学者夏志清和聂华苓等人都注意到了沈从文小说“描写情景的印象派手法”。<sup>①</sup>对于人物肖像、心理、动作的描写也以细腻传神见长。小说《阿巧姑娘》中有一段对于阿巧姑娘的描写:“这女子,穿的是一件月蓝布衣,新浆洗过的样子,衣角全是硬的,衣上罩上一个印花布围腰,把腰就显得很小了。大的脚,青布鞋子简简单单绣了些花。一副长长的腿子走路象跳跃,正合了雅歌所说的羚羊腿子。拖在背后的是一根大辫,象一条活蛇,又黑又软滑地摆动。”作者先描写了阿巧身上衣服、围腰、鞋子的颜色、质地、新旧程度、饰物,这是静态描写;然后动态描写。在动静结合的描写中,一个朴素、纯净的乡下姑娘的形象便跃然纸上了。类似的笔法在人物肖像描写、尤其是女性肖像描写中频频使用,如《长河》中的天天姐妹,《屠桌边》中的“屋里人”,《夫妇》中的年轻妇人,等等。心理描写则颇有意识流小说的特点,如《代狗》中对主人公代狗的内心描写和《船上》中对团长太太的心理描写等,都写出了人物在某种情境中的潜意识。更多之处,沈从文是以动作描写来表现人物心理,如《一天是这样过的》的结尾处:“我脚下的花生壳,蹦来也软软的。”这个不经意的小动作表现出“我”在双十节这一天无聊、寂寞的心情。

富有特色的描写性语言使沈从文的小说具有诗情画意之美。

在沈从文的笔下,无论是绵绵不尽的思乡之情、渴望异性之爱的感伤之情、念念不忘的朋友之情,还是对生命与至美的神往之情、对丑陋人生的厌恶之情……皆弥漫着一种忧郁的抒情气氛。这一艺术效应与沈从文的刻意追求是分不开的,沈从文说:“一切艺术都容许作者注入一种诗的抒情,短篇小说也不例外。”<sup>②</sup>在创作中,沈从文总是力图“……看是不是能产生点散文诗的效果。”<sup>③</sup>忧郁的抒情气氛的产生,“这或许是属于我本人来源于古老民族气质上的固有弱点,又或许只是来自外部生命受尽挫伤的一种反应现象。”<sup>④</sup>有时,作者纯属有意为之,“美丽总是愁人的。我或者很快乐,却用的是发愁字样。”<sup>⑤</sup>在具体的小说中,忧郁的抒情气氛总是与作者创造的“境”相生相成。“境”是沈从文文论中一个独特的概念。在《从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一文中,沈从文指出:“一切优秀作品的制作,离不了手与心。更重要的,也许还是培养手与心那个‘境’,一个比较清虚寥廓,具有反照反省能够消化现象与意象的境。”由此可知,现象与意象是构成“境”的两个要素。

沈从文的小说的确容纳了大量的社会现象与自然意象。

从《菜园》中玉房主人的不幸遭遇中、从《牛》的主人公牛大伯的心境变化中、从《八骏图》里

① 夏志清:《沈从文的小说》,《沈从文研究资料》(下),1991年版。

② 沈从文:《短篇小说》,《沈从文文集》第12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出版。

③ 沈从文:《(沈从文散文选)题记》,《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出版。

④ 沈从文:《(散文选译)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出版。

⑤ 沈从文:《从文自传·女难》,《沈从文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出版。

八位教授的病态人生中、从绅士阶层家庭内部的丑恶行径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作者的悲悯,在社会人生的种种现象中,沈从文写下了自己的价值取向、道德评判,融注了自己的情感。这种悲悯感也附着于树木花草、鸟兽虫鱼、月色繁星、山川河海等大量的自然意象中,所有意象中,尤以水和月的意象为多。水与沈从文的小说有着特别的姻缘,他的许多小说都以辰河、沅水为背景,如《柏子》、《长河》、《鬻名故事》、《在私塾》等,此外,大量的小说还运用了雨、雪的意象,如《雨》、《雨后》、《雪》、《连长》等,以海为背景的小说有《八骏图》、《凤子》、《如蕤》等,所有这些与水相关的意象——汤汤河水、绵绵阴雨、汪洋大海无不造就他的孤独与忧郁,他曾专门撰文谈“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我的教育,也是从孤独中来的。然而这孤独,与水不能分开。”<sup>①</sup>月亮的意象,往往也融注着凄清、孤独、忧伤之情。古往今来的作家中,描写月亮的大家代不乏人。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sup>②</sup>写出了一种凄美、动人的意境,屠格涅夫笔下的月亮富有人性的性情,“月亮好像从明净的天空里凝视着这个小城,这个小城感觉到它那种凝视,敏感而平静地立在那儿,全身沐浴在月光里,那种宁静的,同时又微微地激动着灵魂的月光里。”<sup>③</sup>沈从文《夜渔》、《边城》、《渔》、《月下小景》等小说中月亮的意象被作者赋予某种象征的意味,其中《月下小景》的描写最为典型。小说开头,作者描绘出的是一轮不圆的月亮:“初八的月亮圆了一半,很早就悬到天空中。”——这时的月亮似乎已昭示着不幸;在惟佑与女孩子热恋的过程中,“柔软的白白的月光”伴随着他们心潮的起伏,此时的月亮为俩人的恋情增添了浓郁的诗意;当他们的爱情最终以双双服毒自尽而告终时,“月儿隐在云里去了”。它似乎不忍目睹这残酷的一幕,作者赋予月亮以人格,创造出一种诗情画意的意境美。

不可否认,描写性语言也有功能失调的败笔,过分细腻的描写容易导致冗赘之感,华丽的语言往往也与描写对象显得不相吻合,《腐烂》、《泥涂》、《春》等小说都存在这种弊病。

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大多源于湘西方言,具有雅俗共赏的艺术魅力。沈从文曾说:“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是因为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sup>④</sup>所谓“水上人言语”,即是沅水、辰河一带人所使用的湘西方言。

在日常称呼语中,湘西人有其特有方式,如称叔叔为“满满”,称最小的姑母为“满姑”,苗人把小孩叫做代狗。沈从文在《往事》、《长河》、《代狗》等小说中沿用了这些称呼方式,从而使读者由小说中人物的对白中直观地感受到湘西的生活气息。

湘西人还是创造比喻句的天才,他们善于将人比作动物、植物、器物。据不完全统计,自然界中的十五种动物都被用作对人物的描摹,鸟兽虫鱼皆纳于笔端;有七种植物被用于描写人物情态和顽强旺盛的生命力;把人与器物作比,更富有生活气息。如《边城》中二老傩送对老船夫说的一句话:“……地方不出坏人好人,如伯伯那么样子,人虽老了,还硬朗得同棵楠木树一样,稳当当地活到这块地面,又正经,又大方,难得的呢!”这里傩送将老船夫比作了楠木树。再如《神巫之爱》中,神巫以隐喻的方式将族总比作长江:“年深日久的树尚为人所尊敬,何况高年长德的人?江河的谦虚因而成其伟大,长者对一个神前的仆人的优遇,他不知应如何感谢这人中的长江!”此外,比兴、双关手法在山歌中运用极多,如《萧萧》中的一首情歌:“天上起云云起花,

① 沈从文:《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出版。

② 李白:《月下独酌》,《唐诗三百首》,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③ 《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④ 沈从文:《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包谷林里种豆荚,豆荚缠坏包谷树,娇妹缠坏后生家。”这四句唱词中,前三句都是从自然景象取譬,从而为最后一句作铺垫。在对当地群众语言的借鉴方面,沈从文可谓独具慧眼。

说粗话野也是沈从文笔下人物语言的特色之一。在《我的小学教育》中,沈从文将湘西小孩子打架前挑衅对方的粗话罗列为五种,粗俗的言语表现出乡下孩子野性的活力,再如柏子与吊脚楼上的妓女相会时的对话,简直粗野下流,不堪入耳。然而,恰恰是这种语言最能体现“水上人言语”的风格,那些为生计而长年劳苦于水上的人们无从与典雅、羞涩有缘,放浪,粗直的语言最便于渲泄他们对生活的爱与恨。大量的粗话、野话的运用,使沈从文的小说富有一种野性的魅力。显然,沈从文是自觉地、有意识地使用这类语言的。在《从文自传》中,他说:“我从那方面学会了不下流野话,和赌博术语,在亲戚中身分也就低了些。只有当十五年后,我能够用我各方面的经验写点故事时,这些粗话野话,却给了我许多帮助,增加了故事中人物的色彩和生命。”<sup>①</sup>沈从文还谈到一位口才极佳的曾姓朋友对他的语言的影响:“这位朋友最爱说的话就是粗野话,在我的作品中,关于丰富的俗语和双关比譬言语的运用,从他口中学来的也不少。”<sup>②</sup>粗话野话这种被大多数的文人所鄙弃的语言,在沈从文的笔下却获得独特的魅力与生机,这正应验了施克洛夫斯基所说:“新的艺术形式的产生是把向来不入流的形式升为正宗来实现的。”<sup>③</sup>

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语言有时与人物身份不符,显得不伦不类,间或还有欧化倾向。如《神巫之爱》中神巫的这段话就不免令人生疑:“神啊!你美丽庄严的口辅,应当为命令愚人而开的,我在此等候你的使唤。我如今正从你眼中望见天堂了,就即刻入地狱也死而无怨。”神巫本是湘西神话传说中的美男子,他的言语中出现“天堂”“地狱”这种词汇便显得不相适宜,小说《春》中那对青年男女的对话,则因过于华美而生矫揉造做之嫌,与元气淋漓的湘西方言相比,前者苍白无力、顿失生机。

总的来看,沈从文小说的叙事语言是在现代汉语的基础上,揉合湘西方言、文言和外来语而形成的,主要从叙述性语言、描写性语言和人物语言三方面体现出其特色与功能。就整体效果而言,其叙事语言具有“陌生化”的审美效应,这就使沈从文于京派作家群中独树一帜,也使他与三十年代的其他作家迥然相异,从而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一隅。“陌生化”这一理论术语之于沈从文,意味着他借助小说带给读者的新奇的艺术感受,他的艺术感悟力和驾驭文学的能力是实现这一艺术效果的本源。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sup>④</sup>透过语言的表象,我们才能体会到作家思想的独特与深刻。沈从文也曾抱怨读者对此的忽略:“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sup>⑤</sup>叙事语言是理解作家的直接途径,作家的思想正是借助语言这一媒介得以体现的。

① 沈从文:《从文自传·我上许多课仍然放不下那一本大书》,《沈从文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② 沈从文:《从文自传·船上》,《沈从文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③ 转引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第75页,三联书店于1986年版,张隆溪著。

④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页。

⑤ 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